

信息社会的社会理论与知识劳工

文森特·莫斯科

信息与传播技术为包括劳工在内的世界经济提供了基础,从而使得全球化成为可能。鉴于传播和信息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学者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如何诠释信息劳工及其得以产生的社会性质。本文将陈述该领域的学术史,并以考量百家争鸣的信息社会理论来结束全文。

一、信息工作研究的历史脉络

对于信息传播科技、工作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探讨与论争由来已久。如果要讨论西方世界对这一课题漫长的学术研究史,我们必然会提到致力于思索 18 世纪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型的圣·西门^①的论著。当然还有马克思^②,他在论述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时,曾提到“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形成^③。在此,我还要述及 19 世纪发明“分离机”(difference engine)的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 1832)^④,这是针对计算机的第一个非凡设计。从圣·西门、马克思再到查尔斯·巴贝奇,以及一系列科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都对我们思考工作、科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于本文的意图,最有效用之处莫过于它

① Saint-Simon, H., Comte de. 1952. *Selected writings*. Ed. and trans. F. M. H. Markha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② Marx, K. 1973. *Grundrisse*.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③ 按照教育学的观点,能力系统包括一般智力和专业技能两个要素。一般智力指“概括化的心理活动或智力操作”,它具体可分为学习能力(读、写、算、听、说等获取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和思维能力(想象、概括、推理、决策能力等)。专业技能是指根据该专业知识的要求,在个体身上固定化的动作和动作方式的概括,即专业实践能力。马克思指出:“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直接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219—220 页)马克思的话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大工业技术基础的建立是科学变成直接生产力的历史条件。

④ 在 19 世纪中期,人们开始设计各种处理计算中发生错误的机器,其中最著名的有 babbage 差分机(Babbage Difference Engine)。

聚焦二战之后不断加剧的论争,这期间学者开始注意到制造业之外的产业工作职位数量的显著增长。战后初期,提升测量方法去探测作为经济力量的信息部门增长成为了学术强调的重心。在这一点上,吉恩·富拉斯蒂耶^①提供了最早的关于农业、制造业和欣欣向荣的服务业部门分化的有效分析^②。弗里兹·马克卢普^③是以图表展现数据和信息经济成分扩张的引领者之一^④。由于他所涉猎的知识领域广泛,描绘了人们所熟悉的知识以及形形色色掌握知识的智识者,所以他的研究成果备受青睐。对于前者而言,他对若干种不同的知识类型进行了区分,包括智力的或是源于科学、人文训练的知识。他还鉴别了在工作、家庭或政治领域中,被要求委以重任完成特定工作的一种实践知识的范畴。有趣的是,马克卢普是反思第三类知识意义的先驱。他称之为“闲谈”(small-talk)或者“消遣”(pastime)的知识,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缄默的知识(tacit knowledge)^⑤,我们理所当然地把它视为常识(common sense)。他说明了精神知识和“不必要的知识”或者偶然习得的知识各司其职。他的知识地形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奠定了密切关注知识和信息在社会中的角色的基础。但他的知识景观图远不如他对知识与劳工之间关系的考察那么引人入胜。

被马克卢普称之为知识生产者的这一类人,已为我们认识知识贸易(交易)中各种类型的工作者提供了一条有益的途径。因此我要对他的成果进行详细描述,而且他的研究也证明在信息论短暂的理论史中,马克卢普所作的贡献也不是简短的一个注释就可以诠释清楚的。在通往探究知识劳工的多条坚实路径中,他的论述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马克卢普对一系列的知识生产者作了如下的描述:

(1) 原创性的创作者:这些原创性的创作者吸纳了许多丰富的资料,但同时也根据自己的创造增添大量内容,并且在从他人吸纳进来的观点和他们所传达出去的观点之间,只有微弱的间接关联。原创性的创作者包括科学家、艺术家以及那些重新定义人们既有的对事物

① Fourastié, J. 1954. Predicting Economic Changes in Our Time. *Diogenes* 2 (5): 14-38.

② 吉恩·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é),法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法学博士,艺术与手工制造业工程师,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主任,国立工艺美术学院和政治研究院名誉教授,法国政治科学院院士。

③ Machlup, F. 1962.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④ 弗里兹·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奥地利裔美籍经济学家,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对于知识和知识产业的研究,1962年马克卢普在他的《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2)一书中,在关于“生产知识产业及其职业”中正式提出“知识产业”(knowledge industry)这一概念,并给出了知识产业的一般范畴和最早分类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美国知识生产与分配的最早的测度体系,即马克卢普的信息经济测度范式。

⑤ “缄默知识”,按照英国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在《人的研究》一书中的论述:“人类有两种知识。通常所说的知识是用书面文字、图表或数学公式表述的,这只是知识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知识是不能系统表述的,例如我们有关自己的行为的某种知识。”波兰尼把前者称为“明确知识”(显性知识),而将后者称为“缄默知识”(Michael Polanyi. *Study of Ma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58.)。而波兰尼提出的所谓“明确知识”,意指“可以说出来的知识”(articulate knowledge),即能够用语言加以表述的知识;而他所谓的“缄默知识”,则是指那种“虽然我们知识,但难以言传”的知识,称之为“不能说出来的知识”(inarticulate knowledge)。“我们所知道的多于我们所能说的”(We know more than we can tell),就是这种知识存在的证据。中国道家的名言“道可道,非常道”,说的也是这种缄默知识。

的认知方式和为其他知识工人建构范式的思想家。原创性的创作者正是有创造力的知识工人阶级的核心群体。

(2) 分析家：除规定程序之外，他们在已经被人们接受的知识体系中加入自己的直觉和判断。记者、大学教师、应用领域的科学家，比如计算机软件工程师，今天都应该把他们归入分析家的行列之中。

(3) 诠释者或翻译者：此类知识工人改变了原创信息的形式和内容，但这样做的目的是给那些试图获得原创信息的人以平等的机会。不参与科研的教师、语言翻译、新闻广播员和摄像师都属此种类型。

(4) 加工者：加工者主要指那些改变信息储存的形式和内容，运用常规程序对接收的信息进行专业操作的人，例如他们将这些信息进行整合或评估，从而得出一个独立于加工者自身品味和价值判断之外的确切结果。会计师、新闻通讯社编辑、图书馆中负责图书流通和目录编排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基层的健康专家（比如那些进行例行体检的人）都是加工者的典型代表。

(5) 改编者：改编者和其他群体一样，对接收信息的形式进行了修改，但他们并没有改变信息内容。马克卢普以速记员为例，指出书写年代速记员的作用要比今天更加显著。电话中心的接线员是当代社会中变革者的缩影，因为他们会制定一份特殊的书面计划，并希望据此销售产品、提供服务。个别的接线员可能尝试对信息任意处理，他们甚至偶尔会玩忽职守，但他们清楚地知道“忠于职守”是电话呼叫中心的行业核心准则，作为接线员必须恪尽职守。

(6) 传送者：马克卢普的研究具有广阔的知识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他已经论述过这类知识工人，他们将自己接收到的信息准确无误地传给他人。信使、邮局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将信息内容从一处传到另一处的传送者们共同构成这一群体。

目前，摆在知识工人面前的一个挑战是他们是否能行之有效地在传送者的经历及其在知识等级的高端搭建具体的连接点。例如，高级知识劳工如作家和程序设计员，能否从1997年客车司机工会抗议联合货物运输公司的罢工中总结经验教训^{①②}？这些不同团体是否目标一致，从而确保他们在相同的贸易工会或者工人协会领导下并肩作战？这并非多虑，计算机专家的联盟——华盛顿科技工人联盟会（Wash Tech），其在美国一个较大的贸易工会——美国通讯工人联合会（The Communication Workers of America）的帮助下，便成功地将美国最大移动运营商 Cingular（即 AT&T Wireless）无线广播公司的工人们组织起来。

^① Kumar, D. 2007a. Globalization and Workers' Power: the struggle for hegemony during the 1997 UPS Strike. In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eds. C. McKercher and V. Mosco, 267 - 284.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② Kumar, D. 2007b. *Outside the Box: corporate media, globalization and the UPS strik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马克卢普对知识和知识劳工的认识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但他坦言他不能完成计算知识工人的工作。他说:“我在试图将知识生产活动按照不同的层级(传送者、改编者、加工者、诠释者、信息分析者、原创性的创作者)进行数理统计的时候,我的研究失败了。”而这种“败局”一直到马克·U·波拉特(Marc Uri Porat)的出现才宣告结束^①。

波拉特^②证实了经济发展历经从占主体地位的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制造业),转变为以服务和信息占主导地位的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波拉特不仅通过分析美国人口普查局和美国劳动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报告中的400个职业类型建立了一套统计模型,他还试图克服马克卢普研究中的不足。马克卢普没有充分证实包含那些难以计算的非知识部门的主要产品的公司内部环境的信息活动。因此,波拉特除了认识到包括大众传媒产业、教育产业和计算机制造产业这类主要的信息产业部门容易为人所知的信息价值,他还意识到制造业中由非信息产业公司的信息部门所生产的信息价值,例如制药公司中负责研发的部门所产生的信息价值。波拉特总结上述研究得出结论:信息活动所包含的价值占据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6%。

尽管波拉特对马克卢普的研究有所修正,但他自己的研究仍然招致两个方面的批评。首先,为了尽可能充分地努力阐释经济发展中的信息内容,波拉特的统计数据的问题在于无所不包、面面俱到,太宽泛。在把他的研究扩展到主要信息产业以外的公司的知识密集型部门时,他的研究结果也问题重重。我们不禁要问:每份工作都包含信息的成分吗?甚至汽车组装工人都必须掌握一定的信息才能为体力劳动做决策吗?一个有线电视维修技术员面对一个错误的信号会怎样处理呢?其次,需要考虑的则是权力的问题。把首席信息官员和在同一知识工人群体中的研发部门工作的档案管理员同等看待是否切实可行?毫无疑问,这里涉及更多的问题是他们处于一个团体中完全相反的两个等级,社会地位根本有别,而不是他们都为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信息价值作出贡献。

这些批评论点并不意味着波拉特的研究毫无意义,而是证明波拉特过分强调了自己的观点,即过分强调信息活动在GDP中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个领域的研究任重而道远。与其争论职业结构中究竟能提炼多少信息劳工的成分以便更好地理解GDP的构成,还不如去

① 马克·波拉特(Marc Uri Porat),美国经济学家,他把社会全部经济活动划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4个部门,他和另一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是最早为信息产业做定量分析的学者。1977年其所撰9卷本《信息经济:定义与测量》为美国政府所做的报告是第一份官方测量信息在美国社会中所占分量的报告。创造性地建立起国家信息经济测度模式,成为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论发展的里程碑。波拉特把信息产业划分为一级信息部门和二级信息部门:一级信息部门是直接向市场提供信息产品、信息服务的部门,包括生产知识、具有发明性质的信息交流、通信产业信息处理和传递服务业信息产品制造业信息活动的基础设施提供业等;二级信息部门是指只把信息劳务和资本供给内部消耗而不进入市场的信息服务部门,包括大部分政府公共部门以及一切企业的管理部门,为企业提供的规划财务管理及分析通信电子计算机处理打字复印等信息和服务。二级信息部门的识别比一级信息部门更为困难,波拉特通过测度二级信息部门人员收入计算二级信息部门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测度结果认为,1967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6.2%与信息部门有关。

② Porat, M. U. 1977.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fice of Telecommunications Special Publication 77-12, May. Washington, DC: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认识信息劳工的性质和由于发展所导致的融合和冲突。在此,波拉特通过提供一个信息工作的类型图而作出了一个类似于马克卢普的贡献。他认识到对知识工人做出分类尽管是必要的,但这也是“冒险之举”^①。他展示了三部分的基模,开始将生产和销售信息的工作者作为第一大类,这个群体包括科学家、发明家、教师、作家、记者和图书管理员。第二类知识工人的分类涵盖那些采集和发布主要生产者所发布和销售的信息的人员,包括经理、秘书、职员、律师和股票经纪人。最后一类是信息技术操作者,包括从事系统安装和维护工作的计算机操作员、有线电视安装员和电视机维修工等。

马克卢普和波拉特贡献卓越,尤其是对人们理解知识劳工的扩增及其结构的扩展受益匪浅。但是,他们两位都没有提及这种转变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内涵,而丹尼尔·贝尔^②的研究则更胜一筹,颇具理论复杂性^③。当然,贝尔并不是孤掌难鸣,都兰^④和高尔德纳^⑤的研究就足以证明贝尔理论的深刻性。正是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贝尔在他的时代做出了更彻底的分析,而且他的研究犹如催化剂般闪电式地引来了外界的批判,并为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保驾护航。

贝尔认为,数据和信息工作的增长以及它所引起的美国职业结构的变化都是关键性的发展。在吸收和借鉴了富特与哈特^⑥的成果之后,贝尔绘制出第一张信息社会的经济地图,他描述了信息社会“至关重要的五个特征或是智识部门”的关键作用^⑦。但是,贝尔认为一些远比职业结构的简单变化更加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而且这完全可以说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转型。贝尔从分析五大特征入手去评估这种迈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并用它们来理解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变化。首先,最为基础的是服务业经济的产生,大部分的工人不再从事农业和制造业,而是从事包括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发、教育以及政府等产业在内的服务业。在这些产业当中,贝尔认为涉及保健、教育、研发和政府的职业增长至关重

① Porat, M. U. 1977.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fice of Telecommunications Special Publication 77-12, May. Washington, DC: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② Bell, D.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③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社会学家,其经典之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概括了后工业社会主要的5项特征:第一,经济层面:从商品生产(goods producing)经济转变为服务业经济(service economy),“后工业社会第一个且最简单的特点,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第二,职业层面:专业与技术人员阶层(白领工人)在后工业社会中快速成长,且处于优势主导地位。相对于此,在工业社会,半专业技术工人(蓝领工人)是劳动力中最大的部分。第三,轴心原则,即知识的首要性。Bell强调,后工业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第四,未来取向:新的技术与经济成长息息相关,后工业社会对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与控制,从而减少对经济前途的“不确定性”。第五,后工业社会是一个更加有意识地制定决策的社会。由于政策制定越来越依赖智识技术的帮助,在社会政策的制订上,科学家阶层或是更广义的技术知识分子阶层越来越具有影响力量。

④ Touraine, A. 1969/1971.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 Tomorrow's Social History: classes, conflicts and culture in the programmed society*. Trans. L. F. X. Mayhew. New York: Random House.

⑤ Gouldner, A. 1979.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New York: Seabury Press.

⑥ Foote, N. and P. K. Hatt. 1953. Social Mobility and Economic Advance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3 (2): 364-379.

⑦ Bell, D.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要,因为“这些产业代表了新智识阶层的崛起”^①。贝尔认为第二个关键的发展在于一些精英演变成新的专业化的科技阶级所导致的职业分工变化^②。贝尔主张职业是社会阶级分化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而他所观察到的更“令人吃惊的”变化是受过高等教育者数量的增长,主要有以下几类:

- (1) 科学和工程类: 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工程师;
- (2) 技术类;
- (3) 医疗保健类: 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护士、牙医、药剂师、心理学家;
- (4) 教育类: 大学、中学、小学的教师;
- (5) 普通类: 会计师、神职人员、编辑记者、律师和法官、文艺娱乐界人士、建筑师、图书馆员、社会工作者。

除了分析新经济部门和变化中的职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重要性,贝尔还提出一个崭新的“轴心原则”(axial principle)或者说组织力量,理论性知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置于首位。不仅知识变得更为重要,而且那些聚焦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专业类型知识也已经有所转变。理论知识正在超越经验性的知识。尤其是社会的管理、增长和控制类知识将被编纂成供人们理解各种不同经历体验的抽象意义的符号。同等重要的是关于未来走向,我们特别可以看到科技发展计划的决定性意义。贝尔认为这预示着人类史将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对科技进步进行有意识的规划,将有助于改善长期以来令人困扰的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最后,贝尔认为智识科技的发展与物质科技增长同等重要。通过这一论点,他指出工具的发展,或者我们今天所谓的软件的发展将能够应对先进的工业社会这个复合体。这种发展将在资本主义自身转型的范围中,削弱工业社会的社会关系。

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被资产阶级的企业家和他们的金融家统治了 200 年,但是贝尔认为,伴随着仰赖于知识科技的社会的崛起,尤其是在理论性信息的生产和分配中,一个全新的领导阶级正在大显身手。他们是由训练有素、天资聪慧的科技工人所构成的智识阶级,并将最终引领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已经不是依靠继承财富和权力来获得地位的时代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界精英将最终成为宰制世界的主人。如此的社会不一定会更加民主,但它一定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因为权力的占有者由家族的继承人演变为拥有丰富科学技术知识的受教育者。正在成长的知识工人阶级将真正地掌握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命脉,引领经济的稳步增长并将导致历史性意识形态的衰落。根据贝尔的见解,当科技计算程序和以测量为基础的知识大展宏图之时,针对公共政策的政治抗争却江河日下。

毫无疑问,在上述社会中存在着矛盾,但这种矛盾本质上是技术层面的,而非意识形态

^{①②} Bell, D.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范畴的。在贝尔论述的后工业社会中,唯一的严重分化的潜力会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之外,而是属于文化领域,对此,贝尔将在他的下一部更加晦涩的著作《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1976)中将加以阐述。而这种危险将来自深深沉浸于消费者享乐主义的文化,而且人们逐渐被各种非理性的信念所俘虏。同时,伴随着物质主义的扩张以及对资本主义工厂各种规训的反文化抵制的风起云涌,这两种看似对立的事物将危及后工业主义的根基,因为它们挑战着人们已经被推迟的满意度和支撑后工业社会所必需的科技理性。

避开文化问题不谈,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后工业主义并不具备与生俱来的进步力量。我们从与贝尔出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同年出版物的两个例子中可以得到证实——他的观点也招致广泛的批判。对于赫伯特·席勒^①而言,后工业主义就意味着跨国媒体以及传播业的茁壮成长,其极力支持美国价值观,包括美国军队和帝国的野心,并通过逐渐集中的市场力量消除其他可替代性的选择。席勒赞同其他学者提出的职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的观点,但某种意义上,仅仅是企业权力转向了媒介公司和信息部门。处于主导地位的公司名称及其雇员的工作头衔会发生变化,但阶级结构依然如故。其次,哈里·布雷夫曼^②认为资本家对工作的控制基础并没有改变,包括对劳动过程的拆分,使其由工人控制的过程重组为由管理者所掌控的过程,然后运用科技使工人去技能化,并最终通过体现工人技能的机器化的发展,用机器的“死劳动”(dead labour)排挤有生命力的劳动工人。他警示说,服务业、零售业和专业知识领域绝大多数工人的工作成为严格管制的范围,而且这些工人最终被去技能化,这些工人的命运犹如流水生产线上的劳工一样,最终被科技所淘汰。的确,较之于工业化时代,把思想从实际操作中分离出来,以及集中包括统治阶级的设计和管理的思想权力,鉴于知识工作的非物质性,后工业时代就更加游刃有余。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贝尔、布雷夫曼和席勒等学者对后工业社会予以阐释之后,关于这些议题的论争广泛展开。从历史学^③到民族志学的^④各种视野开阔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为文献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学者们在关键领域已达成共识。例如,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出现由制造业工作向知识性工作转变的浪潮,而在世界的其他国家,这种迹象也在日益凸显。人们一致认为在制造业和农业的工作当中,仍然要求相当广泛的知识。实际上,可以断言,在高度发达国家这些领域的信息工作成分有显著增长。但在今天,越来越多的工作致力于信息、传播和知识的生产与流通。而且,大家一致认为去技能、更新技能和重塑技能

① Schiller, H. I. 1973. *The Mind Managers*. Boston: Beacon Press.

② Braverman, H. 1974.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③ Blok, A., and G. Downey, eds. 2003. *Uncovering Labour in Information Revol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④ Barley, S. R., and G. Kunda. 2004. *Gurus, Hired Guns, and Warm Bodies: itinerant experts in a knowledge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正在发生于职业等级中。尽管是最一致的劳动过程,但这种进程的主导者,不管哪一个主导者,在不同的时段和不同的部门,都不能将劳动过程简化为单一的一系列标准化活动^{①②}。

朱波夫^③从对众多工作场所的调研中证明,企业能够仰赖于员工不断增长的技能获得成功,也就是她所谓的“信息化”(informating)或者增强员工的信息能力,有时甚至包括提高他们的创意能力。然而,人们也一致认为企业从减少工作中的技能成分,甚至是从运用自动化系统将整个工作完全取代中获益。这尤其是指那些传统上由妇女完成的工作,也就是胡斯^④所谓的“高科技无产者”(cybertariat)^⑤。学者们同时认为,随着中等水平工作职位的减少,甚至消失,以及高低职位间信任危机的产生,劳动力当中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明显。这种形式导致的结果之一正是使劳动力市场中的种族和性别不平等进一步增强^⑥。

当去技能和科技替代工作不能实现的时候,企业便通过变动工作,或者迁至国内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通常这些地区是无工会组织的),或者迁到境外的方式,为了达到实现降低生产成本的目标。因为知识工作的典型特点是无需远距离的运输原材料,所以它更易于实践逐渐为人们所了解的离岸外包(offshore outsourcing),或者简称外包工(outsourcing)。该过程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商业劳动社会契约衍生出的商业导向和新自由主义议程的延伸。过去的契约向工人承诺以最低工资保障工人工作并有一系列津贴,这是作为工人放弃所有商业经济权利的回报。今天的公司组织和运行结构都以牺牲工作职位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利润。外部采购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关于它的意义一直争论不休,但学者们对知识工作的重要意义却是英雄所见略同。知识工作的非物质性大大减少了运输成本,无可否认,在一个充满文化差异的世界中,如何成功沟通成为最大的挑战。

并非所有的当代理论家认为非物质性是劳工的负面因素。如哈德特和聂格里^⑦、特拉诺夫^⑧、迪尔—维斯福福特^⑨和拉扎托^⑩等学者一致认为,知识工作或者非物质劳动,换句话说,服务、文化生产、知识或通讯的工作正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的核心。而且,“自主论者”(autonomist)认为这个核心应当是非物质工作,而不仅仅是知识劳动;许多劳动都汲取了情

① Brint, S. 2001. Professionals and the Knowledge Economy: rethinking the theory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Current Sociology* 49 (4): 101-132.

② Powell, W. W. and K. Snellman. 2004. The Knowledge Econom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0: 199-220.

③ Zuboff, S. 1988. *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New York: Basic Books.

④ Huws, U. 2003.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⑤ Tracy, J. F., and M. L. Hayashi. 2007. A librariat? Labour, Technology and Librarianship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n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eds. C. McKercher and V. Mosco, 53-67.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⑥ Burris, B. H. 1998. Computerization of the Workpla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41-157.

⑦ Hardt, M., and A.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⑧ Terranova, T. 2004.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Pluto Press.

⑨ Dyer-Witheford, N. 1999.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 technology capitalism*.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⑩ Lazzarato, M. 1997. *Lavoro Immateriale: forme di vita e produzione di soggettività*. Verona: Ombre Corte.

感技能,而不仅仅是信息化的技能。工人不但必须学会情感表达,而且必须学会如何思考;他们必须表达与所掌握的知识和信息一样多的情感,也就是说,不仅要有智商,而且还要有情商。总括非物质劳动的性质,开启了新的控制劳工新阶层的可能性,比如经理们能够日常化地对工人表达感情,又能对工人有掌握信息的要求。不过正如作者指出的,对于当代的工作进程而言,意味着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ur)需要人们联系和互动。结果,在对资本的反对力量中,通过外部操作的新的劳动形式,和挑战创造剩余价值的体系,工人们获得了价值化自身集体性对抗资本的可能性。正如哈德特和聂格里^①所述,“非物质劳动需要合作的一面不是强加给它或者通过外部力量的组织获得的,而完全是劳动行为本身所固有的特性”。至于生产力、财富和社会剩余价值的创造,都完全依赖于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以及通过语言、传播和情感网络所进行的互动,信息社会暗含着供工人可以用来反抗资本主义逻辑的技能,而不仅仅是促进资本主义逻辑的技能。

二、信息社会的三种重要观点

基于历史上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本文的最后部分将论述三种不同的构成今日信息社会的当代观点。相应的,这三种观点分别集中于数字资本主义、网络社会和作为控制范畴的自主的非物质劳动。

我们首先阐述数字资本主义。对信息社会这一术语最狭义的运用,就是以此描述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特定类型的经济活动的增长。显而易见,信息的生产、流通和交换活动,已经成为比农业和制造业更多的经济活动。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和动力,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生产,以及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经济组织仍然是全球政治经济的核心,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这种状况并没有改变。可以断言,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较过去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苏联共产主义的终结实际上消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挑战,而且由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罕有人能够逃离资本主义的影响。

传播和信息科技通过促进商品化进程而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科技不断深化、扩张,使得测量和监控经济活动的能力不断提升,并持续地对适销产品进行层层外包;而本质上,科技扩展了人们控制时间、空间和人类活动的的能力。无论商品是物质产品还是信息/传播产品,是人的劳动还是消费者和受众,传播和信息科技的发展都极大增强了人们把原子、知识或人转化成销售产品的可能性。但根据这一观点,当科技使生产使用价值的机会不断增大时,人们却并没有根究资本主义的基本属性。借用席勒^②的话说,“数字化资本主义”就是信息社会的经济体系特征。简言之,信息社会首先是资本主义社会。

第二种观点主要集中于网络社会这一概念。这种观点认为信息时代和信息社会代表着

① Hardt, M., and A.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② Schiller, D. 1999. *Digital Capitali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方面通过扩展市场使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特质更加坚固,但同时也对其发起挑战。信息社会并不是一种更多经济活动都和知识与信息有着密切联系的简单的资本主义社会。相反,由于它开发出新的生产形式,无论是体系内部还是外部,经济活动对资本主义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可以确证的是,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为此提供了最好的当代论著的范例,也就是他的论述超越了聚焦资本主义和彻底与资本主义决裂的樊篱。

卡斯特尔^{①②}在“信息资本主义”和“网络社会”这两个称谓之间游移,恰恰说明在维系传统资本主义的基础没有改变的前提下,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种全新的社会模式正在诞生。追寻最有利可图的生产资料的使用的重要性,包括劳动和社会关系的生产,以及持续的再生产,如果还是围绕着传播和信息追求利润,那么这样的社会形态它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然而,创造传播和信息网络的非凡而快速积聚的能量,挑战了资本主义自身管理能力。信息和传播的发展,已经出现价值失范的情况,从简单的免费下载材料,到 YouTube 上发布视频,在网络空间的庇护下洗钱等等,这一切都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的统治优势受到威胁。开放的网络资源和网络黑客使数字世界的财产权遭受挑战。犯罪分子和恐怖主义者运用数字技术隐藏并不断升级他们的行动。各类工会运用网络联合罢工,并为他们的事业赢得国内和国际的支持。本质上说,网络已经开始取代商品而作为社会发展的轴心。按照这一观点,所有这些经常冲突的活动所导致的结果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斥着渴望免费信息和资本主义试图运用信息去创造剩余价值的卓越目标之间的矛盾。

卡斯特尔并不掩饰地游移于两种观点之间,他的论著恰恰体现了学术社群对于信息社会重要性认识方面的矛盾。其他学者的观点更加直率,他们认为从网络模糊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边界,到模糊劳工的物质和非物质性相区别的界限,信息社会正在把资本主义转型为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③④⑤⑥}。

第三种观点集中于传播和信息科技使资本主义越来越难以控制自主的非物质劳动。在资本主义进程和制度的疆域之内,同样不能控制价值的创造过程,资本主义蜕变为规则和关系正在日益重塑的信息社会。根据这一观点,围绕信息网络建立起的社会,消除了工作和家庭、劳动和休闲、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曾经清晰的界限,新的社会形态也因此诞生。反

① Castells, M. 200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Vol. 1 of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② Castells, M. 2003. *The Internet Galax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③ Hardt, M. and A.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④ Hardt, M. and A. Negri 2004.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⑤ Terranova, T. 2004.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Pluto Press.

⑥ Dowling, E., R. Nunes and B. Trott. 2007. Immaterial and Affective Labour: Explored *. *Ephemera: theory and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 7 (1): 1 - 7. <http://www.ephemeraweb.org/journal/7-1/7-1-index.htm> (accessed January 24, 2008).

对力量和民主社会运动的开放路径,凝聚起行动主义者以物质和数字的手段蓬勃发展各类社会运动,他们的使命不是追逐利润,也不为商品和市场所束缚。多数持这种观点的人都乐于承认这不是一个乌托邦的梦想;依赖严密监控挑战了理想国的主张。但根据这一观点,对传统资本主义的各种挑战的多样性和深刻程度的深入,使我们认识到这种全新的社会形态——信息社会也是问题重重的,不可能解决既有的矛盾和冲突。

总之,两个世纪以来的论争,为我们理解由信息和传播科技塑造的社会提供了形形色色的观点和理论。很难确切地说,这是否就意味着是标志三个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之深度和广度的数字化资本主义的增长?或者说,它是否意味着由网络主宰的社会成长不仅强化而且挑战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原则?最后,难道答案就在第三种观点中吗?第三种观点主张新科技的发展胜过资本主义的吸收能力,而且这种非物质劳动将最终导向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一种更加民主、更加开放,不再以市场法律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理论家长期以来一直质疑新科技会对变迁的世界有所贡献。不过对社会变迁性质的看法,仰赖于对这些见仁见智的观点的理解。

(曹 晋、杨保达 译)

作者简介:

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 加拿大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社会学系教授、加拿大政府卓越学者计划(Canada Research Chairs Program)之“传播与社会研究资深卓越学者”(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Communication and Sociology),曾经师从国际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75年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重量级知名学者,莫斯科至今已出版个人学术专著5种,合作编写论著8种,发表论文上百篇,其《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界的经典之作(大陆简体中文版由胡正荣领衔翻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出版;台湾繁体中文版由冯建三领衔翻译,台湾五南1998年出版),确立了构成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起点的三个进程,即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空间化(spatialization)、结构化(structuration),他还主张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对话,并兼容并蓄地回应文化研究与政策研究的挑战。他的研究领域聚焦传播与信息科技社会、媒体政治经济学、知识劳工社会学、传播政策等。电子邮件地址:moscov@mac.com,个人网页:<http://www.queensu.ca/sociology/?q=people/faculty/full-time/moscov>。

译者简介:

本文译者曹晋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杨保达为该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脚注为译者所加。

突破体制瓶颈 推进新闻改革

——纪念中国新闻改革 30 周年

童 兵

1978 年 12 月 13 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是随即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而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一、中国新闻改革的展开及其动力

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覆灭,回到党和人民手中的新闻传播事业,凋敝败落,气息奄奄,面目可憎,声誉俱毁。在人们心目中,新闻媒介等同于造谣机关,新闻与谣言几无二致。共和国的新闻事业面临着重建家业、再塑新闻形象、恢复昔日传统的紧迫任务。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新闻界首先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展开揭批林彪、“四人帮”,清除其在新闻界流毒的斗争。新闻界又以一系列为冤假错案平反的报道,努力把过去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新闻界以揭批“渤海 2 号”翻船事件真相为起始,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拨乱反正为主旨的新闻批评热潮。

三中全会前后,最惊心动魄、令我们今天仍激动不已的三次全国性大讨论,其中有新闻界的一腔热血和巨大魄力。

1977 年 2 月 7 日,深受“四人帮”影响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2 版,第 141 页。

报》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口号。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指导和支持下，新闻界和理论界挺身而出，同“两个凡是”的方针展开英勇斗争。这场斗争，是围绕着另一场大讨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展开的。

1978年5月9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1日，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随之，各地报纸纷纷转载，一场全国性大讨论迅速展开。这次讨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受到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使马克思主义者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打下了思想基础。

这一时期另一次具有全国意义的理论大讨论是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经济建设，但对于为什么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并不清楚。新闻媒介进行了多年的经济报道，总是围绕政治运动转。这种情况，是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的严重障碍。这场一直延续到1981年的大讨论，为实现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起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这三次主要由新闻界组织的大讨论，不仅倡导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有力推动了全党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开始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重新塑造了党领导下的新闻媒介的形象，提高了新闻宣传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望。这是粉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之后新闻战线的第一个大胜仗。

在这初战即胜的形势鼓舞下，新闻界自身开始进行一些新闻改革的尝试。197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小平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引用毛泽东的话第一次不排黑体字，以后其他各报争相仿效，遂成惯例。在此之前的5月1日，《光明日报》已告读者将实行改版。随后一些报纸开始倡导短新闻、快讯、今日讯和昨日讯。

但是，有明确目标，又有相当规模和重大社会影响的新闻改革，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展开的。这其中，从1979年春天开始的三次重要会议，是推动全国性新闻改革的强大动力。

1979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主持召开新闻工作座谈会，会议的首要议题是：新闻工作的中心如何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来？会议号召解放思想，改进工作，把发挥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加强党的集中领导密切结合起来，把新闻媒介办得既有思想性、科学性和战斗性，又丰富多彩、引人入胜。10月，在北京地区社会科学界庆祝建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新闻学组上，与会者提出，新闻媒介要进行自身改革，以更好地满足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1980年2月，北京新闻学会成立，胡乔木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阐述了邓小平的要求：报刊要成为巩固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思想中心，促进这个政治局面的发展。会议提出，为了当好思想中心，就要从加强同实际工作和人民群众的结合抓起，从抓重大主题、新生事物、重大典型、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入手，这是新闻改革的突破口。这三个重要会议，报上发了消息，中宣部发了文件，新闻改革的口号就是这样提出来的。新

闻改革的目标也是在这些会议上确定的。现在有人说,中央从来没有提出过“新闻改革”,纯粹是无视历史的无稽之谈。

当然,新闻改革最强大的推动力,来自亿万民众和时代潮流的需求和呼唤。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了,新闻传媒起初还在抱着“阶级斗争为纲”不放;蓬蓬勃勃的经济建设大潮激荡着每个炎黄子孙,可是媒介上还没有经济新闻的重要座次;亿万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生活的壮丽画卷急切地等待着记者去描绘和反映,但是报纸的篇幅和电视的屏幕到处是领导人的一般日常活动和无穷无尽的会议报道。对于这一切,群众是有意见的。他们在充分肯定新闻传媒粉碎“四人帮”后的进步的同时,也尖锐地批评媒介的种种缺点和不足。人民期待着新闻记者去找他们,期待着自己的活动、欢乐、忧思能在报纸、广播、电视上得到充分的反映,期待着能对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行为进行无情的鞭挞,期待着读到色彩鲜明、清新爽朗、可信可亲的作品,期待着新闻传媒能在推动民主和法制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真正成为既是党的、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喉舌。这一系列期待,汇成推动新闻改革强大的动力。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国门洞开,海外新闻传媒为人们提供了评价和修正中国新闻传播活动新的参照系,广大群众和几十万新闻工作者的价值理念得到了一定的改换和更新,他们不仅看到我国新闻传媒的优势和成绩,也逐步发现我国新闻传媒及至新闻政策的缺点和不足,并且敢于大胆地呼吁改革,设计改革,推动和参与改革。

可见,实行新闻改革,不仅是新时期的历史性要求,而且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不仅是巩固粉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胜利成果,进一步肃清封建法西斯新闻观点的需要,也是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不仅是客观形势使然,也是新闻工作者出自内心的需要。

中国的新闻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内外压力和动力的双重作用下,像一把把烈火,从1979年春天燃烧,席卷全国的。

二、新闻改革初期的任务与成绩

在新闻改革蓬勃展开的热浪中,一些新闻界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进行制度上的深刻反思时提出,新闻界怎样才能跳出“党委犯错误,新闻界也必然跟着犯错误”的怪圈?他们提出一个“良方”:用人民性来制约党性。这个争论最初起于《人民日报》对“两个凡是”的抵制。由于《人民日报》违背华国锋等人的意图,编发一大批同“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稿件,受到华国锋和宣传口领导人的批评。批评者曰:《人民日报》没有党性。被批评者辩之曰:我没有你的党性,但我有我的人民性。这样,就将党性同人民性对立了起来。

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争论吸引了全国新闻界的广泛注意和热烈争论,成为当时直至今天新闻争鸣的重要论题,也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明确批评了“党性来自人民性”的观点。笔者认为,按唯物史观的解释,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只

能来源于无产阶级阶级性,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因此,说“党性来自人民性”,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这一点,多数参与争论的人士,差不多已成共识。许多人还认为,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党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也不应该有自己的私利。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同坚持新闻工作的人民性,不仅在理论上是统一的,在实际工作中也是可以努力做到的。那种用党性代替人民性,或者用人民性代替党性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也有少数人反对把人民性这一概念引入新闻学,胡乔木即为其中之一。但多数人不认同这一观点,20多年的新闻工作实际业已证实,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一个没有人民性的新闻事业,不可能是真正属于人民的新闻事业,从根本上说也不可能是党的新闻事业。

在改革开放之初,新闻界和新闻学术界对极“左”思潮肆虐时期新闻现象的反思和对科学新闻观的追求充满着热情。其中,最显现活力的是1980年5月在兰州召开的西北五报新闻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名为西北五报会,实际上全国大多数省报、主要新闻院校、部分新闻研究单位及中宣部新闻局都派员参加,成为“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性的新闻学术活动。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几乎涉及会后20多年人们研究和关注的主要重大课题。此次会议两年后,1982年5月,传播学创始人之一施拉姆博士在他的学生、香港中文大学余也鲁教授陪同下来华访问讲学,提出向中国系统介绍传播学的设想。在他们的推动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一些学者为骨干,加强了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并在全国渐成风气。这一年11月,全国第一次传播学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我国研究传播学的基本态度。

但是,当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刚刚在全国展开的时候,远远谈不到一帆风顺,凯歌高奏。恰恰相反,而是阻力重重,坎坷重重。当有人对“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命题提出质疑时,有不少人为它辩护。当有人提出报纸有商品属性时,立即遭到不少文章围攻。当党报刊登广告时,更有人把这种做法同“向钱看”相提并论。而当新闻价值、趣味性、新闻自由、传播学、民意测验、舆论调查等新闻观念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而出现于口头或论文时,几乎没有一个不受到非议甚至非难的。当“大众传播”、“媒介”这些舶来的新名词出现在党或政府重要文件的头几稿提交专家讨论时,有多少人为之高兴雀跃,而当这些文件最后定稿公布时又不见了这些新名词时,又让多少专家失望沮丧。

在这种种情况下,新闻改革最初的着力点不得不放在具体新闻业务的改进上,这也许正契合中国温和型、渐进型改革的要求。支持这一结论最好的证明,便是1981年11月在庆祝新华社建社50周年茶话会上,习仲勋代表中央书记处讲话,他没有围绕当时有争议的诸多理论问题发表看法,而是重点讨论新闻业务问题,他对新闻报道提出的五点希望——新华社称之为“五字方针”,以及由此而在全国普遍展开的新闻业务改革热潮。这五点希望是:一是真,新闻必须真实;二是短,新闻、通讯、文章都要短;三是快,新闻报道要快发,不快就成了旧闻;四是活,要生动活泼,不要老一套、老框框、老面孔;五是强,要做到思想性强,政策性

强,针对性强。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在新华社带动下,全国各新闻传媒纷纷行动起来,开设新栏目,创办新媒介,出现了一大批新创刊和复刊的报纸、刊物以及新创办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发表了一大批既有指导性又充满着可读性的好新闻、好通讯、好评论和好节目。不久,评选好新闻的活动也在全国开展起来了。此后,还发起了“新闻写作散文化”的研究与实践热潮。

我们可以把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作为中国新闻改革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新闻改革的主要成就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新闻传媒的指导思想有所调整,有所改变,逐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为中心。新闻业务针对空泛、陈旧、拖沓、迟缓等弊病,以“真、短、快、活、强”为目标,努力多写新闻,快写新闻,写好新闻,使新闻的信息量、时效性、服务性、可读性在确保鲜明的指导性和思想性的前提下有较大的改进。这一阶段短新闻写作和现场短新闻写作的大量涌现,是其中突出的成就。

第二,新闻观念得以更新,一些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闻新观念得以确立。诸如:

破除单一的党报观念,确立国家和人民新闻事业的观念,推动形成和发展以党报和新华通讯社为核心,报刊、广播、电视相互配合,多类型、多样式、多层次的社会主义新闻媒介网。

破除单一的党性观念,在突出和强化党性的前提下,确立新闻事业的人民性、群众性、民族性等多种观念,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对领导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结合起来。明确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既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又是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

破除单一的指导观念,确立指导就是服务的观念,把新闻的指导性和新闻的服务性、新闻的思想性和新闻的知识性趣味性结合起来。明确新闻传媒的社会责任不仅是上情下达,而且同时肩负着下情上达、下情互达的使命。

第三,对传媒和新闻的多种功能、多元作用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和实践,由单一的宣传功能,转变为新闻、宣传、信息、舆论、表达等多种功能。长期以来,党领导的新闻事业只注重宣传功能,注重新闻以至媒介的宣传价值,而对新闻的新闻价值、信息价值、审美价值等多元价值注意不够,更缺少有力的措施去开发利用。在新闻改革中,人们逐渐认识并强化新闻的传递信息和新闻、引导舆论、沟通情况、传播知识、提供娱乐、刊登广告等功能,使新闻事业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全面发挥这些功能的过程中,进一步使媒介自身得到改革和完善。

第四,新闻传播的方式和方法得到一定的调整和改善,传播效果有所改进。

改变过去单向传播模式,代之以双向交流、上下沟通的新模式。

改变过去说教式的宣传方式,代之以对话、交流等平等协商的方式。

改变过去封闭僵化的传播秩序,代之以开放、灵活的新秩序。

在新闻工作者的努力之下,过去新闻界禁令过多,禁区重重,以致造成千报一面、千台一腔的新闻传播格局有所改变。在改革中逐渐放权“松绑”,增加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透明

度,强调新闻报道的公开性,“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扩大了新闻报道范围,增加了新闻言论自主性,减少了新闻批评的限制,强化了新闻工作者的主体性,整个中国的新闻事业,开始呈现开放搞活的态势。

三、一场攻坚战:改革新闻体制

随着新闻业务改革到一定的广度,新闻观念更新到一定的深度,新闻功能和传播方法改换到一定的敏感度,新闻改革往往会遇到新闻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弊端所造成的种种障碍。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现有新闻体制的成因与功过,如何设计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发展状况的新体制,这些问题在1985年就提出来了,而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新闻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才真正摆上全国新闻界的议事日程。

我国现存新闻体制,是沿袭延安时期党报体制和苏联斯大林时期新闻模式的产物。这两种体制和模式的共同点是:单一党报体系,高度集权调控,强化宣传功能,经费和发行国家包干。这种体制在战争年代基本可以适应当时的媒介生态环境,而到了建设时期尤其是面临世纪之交的科技革命新时代则弊端四起。因此,新闻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成为新闻改革最迫切的课题。

1985年以后新闻界提出了下列新闻体制改革的设想:

第一,建立多种新闻传播渠道,便于广开新闻信息资源,扩大报道面,加大信息量,也利于新闻媒介之间和新闻工作者之间展开社会主义自由竞争。

第二,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权形式的新闻机构,以利于反映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不同利益诉求,其前提是新闻编辑的方针必须同四项基本原则保持一致。

第三,对每一个新闻传媒,允许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反映不同利益集团及社会公众的要求和呼声,即放开经营自主权,让负实责的媒介编辑部自己对报道内容负责,同时享有完全的经营权。这种体制改革的设想被概括为“一向多声论”,即在坚持社会主义的统一政治方向条件下,“报纸发什么不发什么由编辑部和总编辑说了算”。

在这三种设计下,一些地区和一些传媒进行了小规模尝试。在一个阶段里,多样化的报业结构建设初有进展;报台之间、报台与新华社之间的竞争已经展开;在一张报纸上有时可以听到反映不同意见和观点的声音,初现“多种声音,一个方向”的新局面。

但是,好景不长。总体上说,体制改革是新闻改革中难度最大的一场攻坚战。体制问题事关全局,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稳妥谨慎地进行。从理论上说,新闻改革应该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鸣锣开道,摇旗呐喊,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一旦进入体制改革攻坚领域,新闻改革必须以成功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为必要前提。离开后者,新闻界单打独斗,风险太大,不测风云时会出现。经验告诉我们,从事新闻体制改革:一是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至少是同步而行;二是必须认真规划,从长计议。因此,党中央对